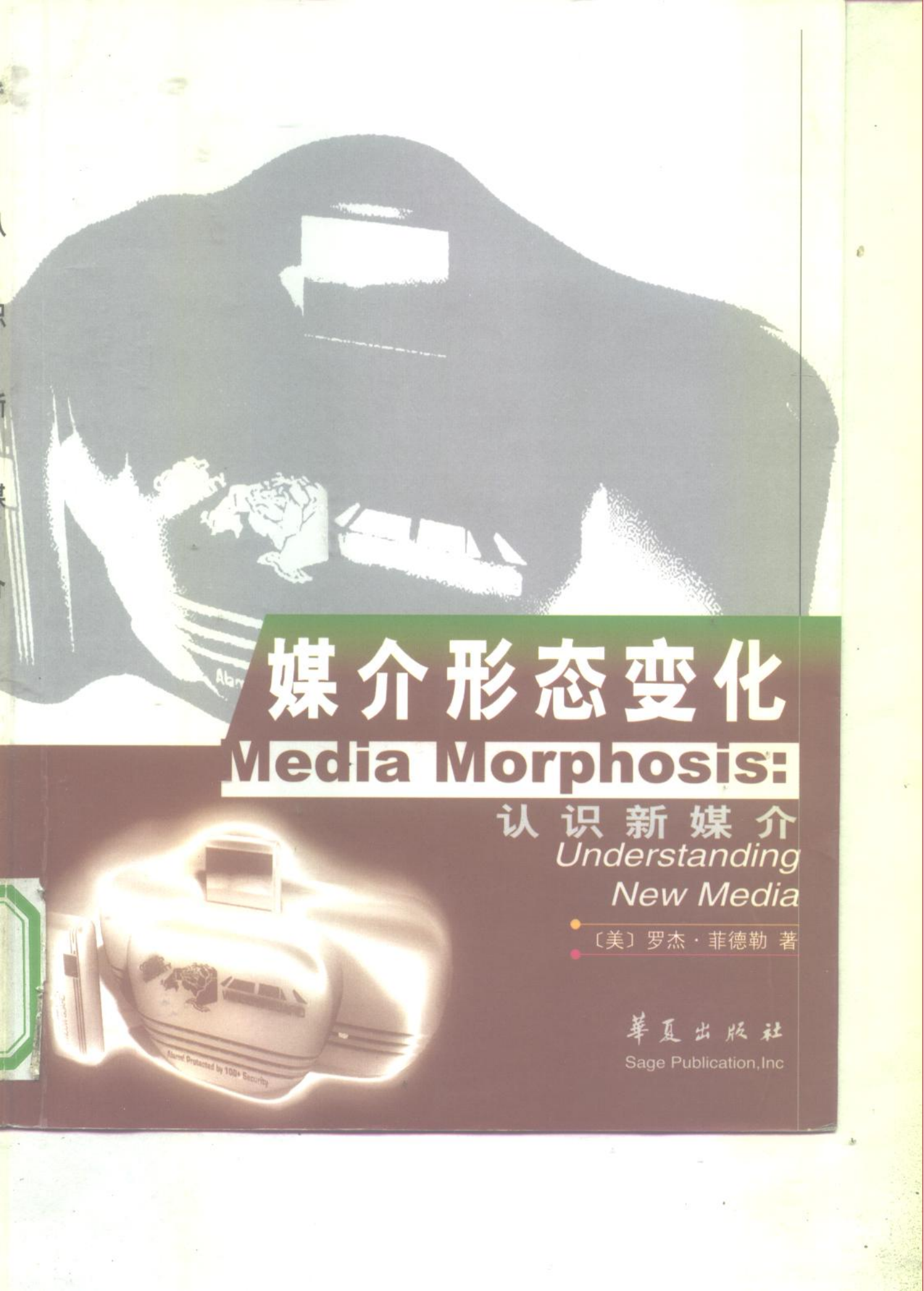




媒介形态变化

Media Morphosis:

认识新媒介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美〕罗杰·菲德勒 著

华夏出版社

Sage Publication, Inc

526690



526690

北京广播学院指定教材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

媒介形态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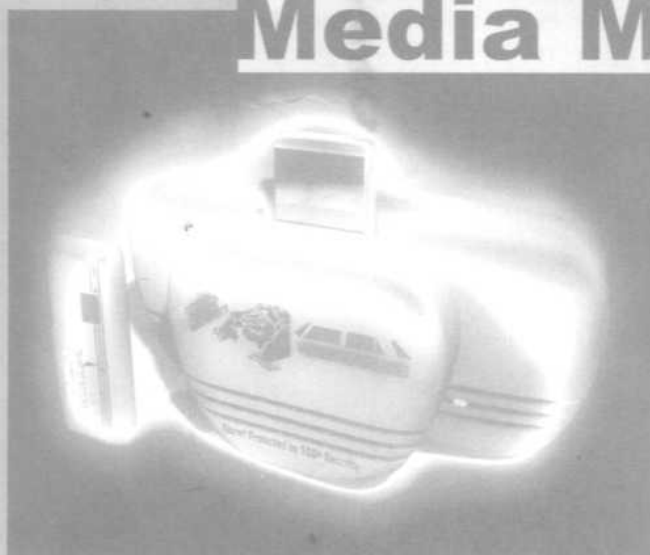
Media Morphosis:

认识新媒介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美] Roger Fidler 著

明安香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美)菲德勒(Fidler, R.)著;明安香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
书名原文:Media Morphosis: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ISBN 7-5080-2092-8

I. 媒… II. ①菲… ②明… III. 传播媒介-高等学校-教材 IV. 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617 号

Roger Fidler: *Mediamorphosis: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Copyright©1997 by Pine Forge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本书英文版于 1997 年出版,版权为 Sage Publications, Inc. 所有。

本书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 Sage Publications, Inc. 授予华夏出版社,版权为

华夏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1999-1695 号

媒介形态变化

[美] 罗杰·菲德勒 著

明安香 译

策 划: 刘 力 蔡 翔 刘淑兰

责任编辑: 李钊祥 蔡 翔

监 制: 王玉洁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30×988 16 开

印 张: 17.75

字 数: 29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学术顾问: 杨伟光 甘惜分

主 编: 刘继南

副 主 编: 胡正荣 丁俊杰 张国良(特邀) 刘 力

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俊杰

刘 力

陈卫星

张 昆

张国良

明安香

孟 建

胡正荣

段京肃

袁 军

徐耀魁

郭庆光

郭镇之

喻国明

蔡 翔

献给阿达
她的爱使本书成为现实
还有
怀念詹姆斯·K·巴顿
记者、良师、益友

总 序

我们知道，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人类的传播活动开展伊始，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过。

最早的传播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和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我们尚能每每从《修辞学》或《论语》中找寻到对传播现象研究的精辟论断。

虽然早期的传播研究提出了不少值得后人珍视的观点，但遗憾的是，它们都不可能实现传播研究向传播学的转化。这种转化实际上是一种飞跃，即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学术范畴的完整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成果的系统性的形成与确立。

真正认识到传播活动的本质，利用自己学科的范畴研究传播活动，从而认识传播规律，进而产生传播学这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还只是本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情。1949年，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编辑出版了《大众传播学》，第一次提出大众传播学的框架，汇集了前人有关大众传播的研究成果，它标志着大众传播学正式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的开始。人们在对大众传播规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范畴和理论体系普遍化，继而形成了传播学。

传播学的诞生与壮大是建立在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的基础上的。宏观上，现实社会及经济形态中信息资源的地位越来越高，信息流动带来的价值和效益越来越大；微观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信息及信息的传播媒介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愈发彰显出它的重要性。于是，人们日益关注和研究信息及信息传播的规律。另外，百余年来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都为传播学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并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几十年来,传播学在美国和欧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科不断壮大。美国的传播学以其实证、定量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体系庞大、成熟且关注现实的学科特点;欧洲的传播学以思辨、定性的研究为专长,蕴涵深刻的思想,敏锐而具有批判性。当代传播学研究如何适应社会形态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传播形态的进化,不断地调整自己,加快发展,业已成为全球传播学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社会上及学术界对传播学的认识程度不高,目前只是处于传播学研究的初级阶段。1978年,复旦大学新闻学刊物《新闻大学》上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一方面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另一方面则建立基础,调整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致力于深化本土的传播学研究。毋庸置疑,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从无到有,确实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这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学科体系中已经确立位置。

但是,在中国传播学界空前发展的繁荣景象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西方传播学发展迅速,成果不断,但我国全面而忠实的译介甚少,而且,在目前为数不多的译著及译文中,仍然存在误读之处,这在相当程度上会对初学者产生一定的误导。

为了使我国的传播业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当前迫切需要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系统介绍国外先进传播理论与实践的优秀教材,以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水准的传播工作者,推动我国传播业的发展;强化传播学的学科建设,繁荣传播学研究,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与具有远见和紧迫感的华夏出版社精诚合作,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遴选书目、洽谈版权、商定体例到布置工作等一系列的繁冗事务。

为了本译丛能够高质量的出版,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严格把关:

首先是书目的选定问题。我们的原则是,首选那些经过教学与实践严格检验,在西方传播学界有较高声望和影响的优秀教材和经典专著。既要有传统学派、批判学派的名作,也要有针对学理与学术在不同层面所作的思考。力求全面、系统地反映出传播学在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在不同形态下的传播实务进行的探索。

其次,在翻译的组织上,尽力为每一本书审慎地选择合适的译者。他们中既有多年从事传播学教学与研究的专家、教授,也有留学国外的博士及中青年学术骨干。在要求信、达、雅的前提下,严格遵循学科规范,精益求精。

最后,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要求以教材的高质量标准,在编校、设计、版式、开本、材料、印刷等诸环节严格向国际标准看齐,从而使一本好的原著,经过认真的翻译,出成一本好书。

译丛的第一系列已经与读者见面了。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固然可喜,然而,前面的路还很长。无论是译介国外的已有成果,还是进行本土化的自主研究,我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仍然需要我们不懈地努力。由于受我们的认识水平及信息所限,可能还有一些好的传播学著作暂时未能进入这个译丛。好在我们立志将长久地致力于传播学教材及专著的翻译、编写与出版,因此,这个译丛是开放式的,欢迎各界专家、学者给我们推荐更好的传播学著作;我们也衷心地欢迎有识之士的参与,让我们不断努力,把这个工作共同做好。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传播学 编委会

1999年12月

中文版序

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革命之中，对此再也不能有任何怀疑了。这是一场全球规模的革命，而且，它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展。这场革命的种子早在工业时代开始时的 200 多年以前就被播撒上了，但是，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两个十年，它们才开始生根并且开始扩散到全世界。

我在这里所说的革命就是数字式革命。数字式语言（即计算机的数字语言）是这场革命的中坚力量和变革的主要催化剂，正是它们带来了这次重大转型，我称之为人类传播史上的第三次媒介形态大变化。它超越了人类的一切语言，它有力量变革现存一切形式的传播媒介并且创造出崭新的形式。

到处都可以明显地看到，我们交换和加工信息的方式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从我完成这本书的英语版以来的三年中，互联网和环球网已经把各个大陆上的上千万人联系起来。新闻、信息和商业每天都正在以不断膨胀的电子脉冲洪流和近乎光的速度跨越各种政治边界。

今天，在美利坚合众国各地大学学习中国学生能通过电子邮件与他们的同事和家人很方便地保持接触，并且能通过环球网读到中国报纸提供的最新新闻报道。同样，在中国的外国实业家和旅行者也可以几乎即时接触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新闻报道。数字式信息实际上正在迅速地变得对于任何拥有个人电脑和电话的人来说，都是可以享受得到的，其数量大得令人吃惊。

当新闻媒介仍然习惯于聚焦互联网和环球网的时候，要知道，它们并不是在过去几年中崛起的新媒介的仅有几种形式。数字式书籍和被称作电子书籍的便携式读书装置和平板装置，已经开始为浆纸和印刷机提供很有发展前景的替代品。报纸和杂志还有书刊的数字版很快就有可能常规地传输到像纸一样的便携式电子屏幕上并且显示出来。电视和收音机也在因为数字式技术而转型。新的数字式标准除了能改善传输的质量以外，正在创造出诸多机遇，使得电视和收音机的节目更具交互性，而且更易于为全球所接收。

虽然今天传播媒介的新形式看起来好像多得令人生畏，但是我们

需要认识到,数字式时代还只是刚刚开始。如果数字式技术继续以其现在的步伐演进,到了2020年微处理器的功能与它们今日相比,将至少要强大三个数量级(即1000倍)。同样到了那一年,整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共同享用到的带宽(传送数字式数据的能力)也可能至少比今天大1,000倍。人类究竟可以运用所有这些强大的计算和传播能力都能做些什么,这在目前已经超越了任何人的想像力。不过,通过回头去看并且仔细地考察传播媒介和文明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进化路程,我们就能够找到为我们洞察未来提供可贵的模式和原则。这就是《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这本书的基本前提。

我要感谢明安香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翻译了这本关于媒介形态变化的书。当明教授1997年夏天在肯特州立大学进行学术访问的时候,我有幸认识了他。他对于新媒介和我书中的一些观点的关注,导致了在大学和我家中几次富于启发性而且甚为愉快的讨论。就在他要离开肯特之前,他找到我商议出版《媒介形态变化》一书中文版的可能性。对于他认为我的书有足够的价值在中国出版,并且值得他投入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来联系出版和翻译,我当然感到非常高兴。我知道,没有他的执著努力和坚持不懈,这个中文版是不可能面世的。

罗杰·菲德勒

新媒介教授

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

肯特州立大学

肯特郡, OH 44240

电子信件:rfidler@kent.edu

作者简介

罗杰·菲德勒是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驻校专家和信息设计实验室协调人。他是一位国际公认的电子出版预言家和先行者。

他在报业领域作为新闻工作者、设计师和技术专家工作了三十四年，从1979年起一直积极致力于新媒介的开发。1981年，他产生了开发电子平板报纸的想法并且在十年以后作为哥伦比亚大学自由论坛媒介研究中心研究员开发出了早期模型。从1992年到1995年，他担任了位于科罗拉多州玻尔德的信息设计实验室主任。他还在1985年创立了第一家服务于报业的在线电脑服务——报业在线（PressLink），1983年创建了赖特-里德图形网络（现为KRT图形）——第一家为报纸设立的电脑图形网络。1979年到1983年，他是赖特-里德有线图文开发组的主要成员，并且担任视特灵（Viewtron）公司商业服务设计第一主任。

他的报业生涯开始于1961年，在俄勒冈州尤金市一家周报“什么事都做一点”，以帮助他度过在俄勒冈大学的生活。此后，他工作过的有：尤金市《注册—卫报》、埃弗里特的《先驱报》、《太平洋星条旗报》（东京）、圣皮兹堡《时代报》和赖特-里德报系。他担任过的职务有：科普作者、记者、校对编辑、星期日杂志编辑、美工、摄影记者、艺术主编、美工主编、设计主任、新闻编辑室系统经理和公司顾问。在1974至1984年期间，他重新设计了三十多种报纸。他是报纸设计学会（SND）的创始人。

序 言

这十多年来最大的困惑就是关于新媒介。人们和公司都在问：何谓新媒介。在当今已经达到饱和程度的媒介里，还有什么事情是人们需要从媒介得到而媒介没有提供的吗？它将采取何种外部形态？新媒介的产业能够形成吗，如果能，它将需要多长时间？类似的问题层出不穷。

今天，新媒介是有钱可赚的。但是，赚钱的是那些行业内部演示会的主持人，各种会议的组织者，律师和其他一些人，包括屈指可数的、允诺给出各种答案的书籍作者。在《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这本书中，罗杰·菲德勒和我知道的其他作者一样也要回答这些问题。

当今，探讨新媒介的难点是互联网。如今的互联网上，上网费用高，艺术上也很幼稚，慢得难于忍受，垃圾泛滥成灾。同时它也很精彩。它让那些没有无线电、电视广播频率或印刷机的人们发出声音。它超越国界；有人抱怨它是不统一的根源，但是如果你从全球化的角度考虑的话，它就成了统一的源泉。它可以扫除商业贸易的“准入障碍”；今天，媒介的价格不菲，但是只要你有一点钱再加上足智多谋，你就有机会开办一项互联网的业务，而且开张伊始，它就是面向国际营业的。不需要买地皮，不需要盖建筑物，也不需要安装贵重的设备，只要有一些逐步增加的项目设计和市场营销的投资，就足够了。

最后，新媒介已经帮助人们离开那些稠密的城市，那里尽是一些似乎一筹莫展的成堆难题，人们要么通过联网的电脑相互交流，要么去开办不依赖场地的业务。摆脱了对场地的依赖，不仅解放了个体，而且为人口的非均匀分布提供了初步的解决方案。

那么，这种令人神往的发展，未来又将是什么样子的呢？坦率地说，那些对这些事谈论得最多的、声音最大的人，并不知道其究竟。我们被那些写故事而对故事的最基本的来龙去脉都一无所知或只字不提的人带到了“超级电脑空间”。而罗杰·菲德勒没有犯这样的错误。

他有一个多产的头脑，有一个经验丰富的数据库，并且让我们享受到关于未来的极为广阔的思维。罗杰将我们带进“超宇宙”，在那里，我们能应用个人代理、视频邮件、电子货币和其它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型个人工具。他描述的未来很可能是正确的；当然，谁也不可能有一个比罗杰·菲德勒更好的实验室去探索下一个世纪的新媒介，尽管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他的某些理论在将来很可能证明只是理论而已。

罗杰的研究和大作的特别助益在于，为我们所有的人思考媒介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极为有用的脉络。他给我们不仅展示了一个充满想像力的未来，而且展示了一个富有脉络感的未来。他知道，许多人对媒介的历史关心甚少，可是没有对媒介形态变化的理解，是不可能得到答案的。他勾画了一幅幅与惯性相抵触的、令人陶醉的二十一世纪风情图。任何真正对新媒介感兴趣的人都必须知道这两个方面。

艾尔弗雷德·C·赛克斯

前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

赫斯特新媒介和新技术总裁

前 言

me · di · a · mor · pho · sis (me' de - a - môr' fa - sis) 名词。传播媒介的形态变化，通常是由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相互作用所引起。

当我在 1990 年^①杜撰了媒介形态变化这个词来做一篇文章的暂定名时——这是一篇关于报纸未来的文章，我从来没有想到它还会成为一本书的书名。因此，当负责编辑那篇文章^②的编辑克雷格·拉梅当时对我说，他认为这个术语值得保留并建议我把这个概念生发开去时，我不禁受宠若惊。当时，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崭露头角的信息技术及其对报纸的潜在影响上，但是不久以后表明媒介形态变化的范围远远要广阔得多。

第二年，自由基金会（前甘奈特基金会）给我提供了一笔研究基金以探索媒介形态变化的思想并在其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媒介研究中心开始写这本书。在电子媒介领域前沿探索十多年以后，堪称得是“血染弓刀”，我发现自己渴望有一个我设想的相对放松的学术间歇时期。所有需要我做的一也许我想的太天真了一只要把我在美国第一家用户有线图文系统和在线电脑服务的某些经历中学来的教训写进去，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媒介研究中心搜集一些额外的佐证资料，再谈谈我对报纸未来的看法就行了。但是我很快发现我原本想描述的这些变革涉及到整个人类传播系统，媒介形态变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我在人类传播史和呈明显融合趋势的传播技术上钻研得越深，我就越感觉到我们很可能是正处在自书写语言出现以来人类传播

① 近来查阅期刊档案发现早在 1972 年就有几次使用“mediamorphosis”一词的先例。然而，它们都是在政治场合中用以描述媒介对政治家形象的影响（例如，“乔治·布什的媒介形态变化”指“媒介歪曲”——译者注）。

② The article, “Mediamorphosis, 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spapers into a New Medium,” appeared in the Fall 1991 issue of *Media Studies Journal*.

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中。

到我完成了一年的研究项目时，我发现我原来的许多想法本身已经经历了它们自己的形态变化，而这本书离完成还差得远着呢。我原来以为能有充足的空余时间来写书的指望，很快就被突然产生和骤然复活的对于传播新形式的兴趣而排除。从光盘驱动器和多媒体电脑系统到个人数字式助理和互联网，所有这一切几乎都在同一时间内作为现存的媒介和电信公司的潜在威胁和机遇而出现。所有这些活动看来都证实了我的感觉：巨大的变革即将发生。

尽管《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是一本关于人类传播系统和当今媒介产业内部技术变革的书，但是它不是一本技术书籍。我的目的一直是尽可能使得新出现的媒介技术不那么神秘，同时提供一个架构以便了解它们对于当今主流媒介的流行形式——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等的潜在影响。

虽然本书探讨的许多观点和见识出自于我的研究成果和亲身经历，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握有关于未来的任何秘密或绝对知识。我所能提供的都是我对我所能搜集到的数据的解释。我也不能说我自己就是完全无偏见的。我已经在报界担任职业新闻工作者、设计师和“技术专家”三十多年，因此我的经验和归属感肯定要影响到我的看法。

第九章中关于数字式印刷媒介的前瞻看法是我自从1980年代以来深深涉足的领域，当时我开始认识到电子平板显示装置提供的出版机遇。当时我知道，对于出版家来说这种技术的实际应用至少还要一二十年以上，但是它所引发起来的数字式印刷媒介的前景实在是让人难以释怀。1981年，联合报业执行主编协会（APME）邀请我提交一篇关于报纸未来的论文，使得我第一次有机会撰写有关电子平板媒介的论文并且制作了几页供演示用的模型。^③

整个1980年代，我一方面在赖特-里德报系发展其它新媒介的机会，一面继续提炼我的观点。各种“便携式数字文献阅读器”方案开始出现在几家书籍和杂志上，这个方案最初是由我在1988年为美国新闻研究所的一个出版物创新设计的。^④从1992年起，我就一直积极地投入开发平板式出版系统，起先在位于科罗拉多州玻尔德的赖特

③ This article appeared in Associate Press Managing Editors Special Report, *Newspapers in the Year 2000* (New York: Associated Press, Fall 1981).

④ “Plugging into the News,” in *Newspaper Design 2000 and Beyond*. Reston, VA: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 1988, pp. 36-41

—里德信息设计实验室担任主任，最近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担任顾问和驻校专家。尽管由于我对各种新媒介的涉足推迟了本书的完稿时间，但是这同时也非常有助于媒介形态变化概念的形成。

在今天不管有多少悲观的预测是多么司空见惯，我对于新闻和印刷媒介的未来展望还是乐观的。我的希望是我表述的事态和解释将有助于鼓舞和激励那些对于当今媒介，尤其是对于书面文字的未来抱有不只是一时兴趣的人们。

致 谢

没有赖特—里德报系和自由论坛基金会提供的基金、时间和构思环境，《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的问世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要特别感谢已故詹姆斯·K·巴顿——赖特—里德报系总裁和首席执行官，感谢他毫不动摇的支持和信任，还有埃弗里特·丹尼斯——媒介研究中心前执行主任，感谢他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并且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我也要衷心地感谢琼·科尔曼、克雷格·拉梅、马克·撒尔希默、雪莱·加西、戴芭拉·罗杰斯，以及媒介研究中心的所有其他工作人员。我在纽约期间与每一位伙伴共享的休假经历都丰富了我的生活，不过我要特别感谢克利夫兰和佛朗希斯·威尔霍伊特夫妇的帮助和友情。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会见了许多媒介和技术公司的领导者，他们都值得接受我的衷心感谢。我要特别感谢约翰·希里·布朗——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主任，感谢他拨冗与我分享他的有关文献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观点。我也想向乔治·吉尔德——《电视以后的生活》一书的作者——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他对于我的媒介形态变化观点的贡献。

感谢出版人——斯蒂夫——感谢他的信心和耐心，还有各位主编——里贝卡·史密斯、邓肯·麦克唐纳、雪莱·拜吉和麦吉·莫里兹——在整个辛劳的过程中，他们都和我工作在一起，虽然这是他们的职责，但是在这里他们都特别值得赞赏。没有他们，我真的要怀疑这本书是否能够完成。他们的贡献甚多，不管这本书能有多大的成功，他们的贡献绝不在我之下。还要感谢派恩·弗吉出版社推荐的下列评阅人，他们对于书稿的意见和帮助是无价之宝：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卡

罗琳·克莱茵；肯特州立大学帕姆·克里顿；希腊丘斯大学琼·德帕；乔治亚州立大学克里格·里斯比；田纳西大学苏珊·鲁卡里莉；哥伦比亚大学约翰·帕夫里克；得克萨瑟 A&M 大学苏珊娜·霍尼格·普李斯特。我要向明尼苏达大学的凯斯琳·A·汉森表示特别的感谢，她多次阅读了书稿初稿并迫使我写了一本好书。尽管阿洛德·伊斯马克——俄勒冈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前院长——不是本书的责任编辑，他却在细致阅读各阶段书稿和为我提供富有真知灼见的建议方面从不推诿。对于他们，我将永远感激和感谢。

如果不感谢另外三位非常特别的朋友，这本书的致谢就是不完整的，他们是：巴里·哈特曼、戴维·埃默里和罗伊·保尔·纳尔森，当我还是一个俄勒冈大学学生的时候，是他们帮助我从天文学转到了大众传播学。最后，我要向本书的最重要的贡献者——我最好的朋友、伙伴和妻子阿达·维果表示我最热烈的感谢之情。

罗杰·菲德勒

rfidler@saed.kent.edu